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楼劲◎主编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楼劲◎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楼劲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6791 - 5

I. ①魏… II. ①楼… III. ①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35.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1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3
插 页 2
字 数 727 千字
定 价 1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楼 劲

执行主编 戴卫红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欣 李书吉 何德章 陈长琦

尚永琪 胡阿祥 韩 昇 章义和

努力建构中古各时期的历史场景 和发展脉络 (代序)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已于2014年10月在北京顺利举办。各位代表的参会论文，在大会发言或分组讨论时已作交流，胡阿祥先生在闭幕式上对之作精彩的总结。现在出版的这部论文集，是按既定安排和与会代表的意愿遴选结集的，尽管还有部分论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但大体上仍可代表这次会议获取的学术成果，也是学会同仁近年研究心得的一个反映。对于一段时期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来说，这应当是有其代表性和学术推动意义的。

近年来，我在不少场合听到过史界同仁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赞许。我知道这些不是客套话。相比于中古史其他断代，这些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确实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些特点：思想较为活跃，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构想较多，面对新观点、新方法时以我为主的品格较为突出，似已开始形成了政治、制度、思想综合研究的轴心，民族、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因此而有重要进展。青年学者表现尤其突出，他们视野开阔而观察敏锐，史实和材料的诠释能力较强，立论所据的个案分析相当扎实，不少提法都蕴涵了重要的研究新方向。这些都是至为可喜的。我觉得其所体现的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仁对学界现状有更多的反思，而其实质是对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史学所处之境的一种突破，可以视为21世纪魏晋南北朝史反思开启了新的重要开端。

自20世纪80年代初，久被束缚的思想得到释放，诸般外来引进和回

归传统之说纷纷争鸣，各种学科规划则平衡其间而陆续实施。由于积累本甚不足，学术分量仍嫌单薄，其中饱含的真挚和诉求，本就易随时过境迁而稀释淡化，一朝重挫更易一蹶不振。故至世纪之交，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是中古史界既否定了过去，又看不到将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既乏有效的继承，也缺有效的发展，曾经得用的框架和结论均成问题，业已形成的历史勾勒相互冲突，又各存在着太多的悬疑和空白。这就使原来多少有其中心和条理的历史，似乎陷入了一团混沌，其中多是缺乏整体结构背景的大小碎片，这些碎片无论可以填补多少空白，却就是放射不出映照未来之光。史学至此，可谓方生方死而不绝如缕，也就无怪乎各种业余说史者的大放异彩了。

因此，一段时期以来的中古史专业研究者，确已面临着一个中心任务，那就是“梳理”。这是因为历史非经梳理即无从显其问题、趋势和规律，被解构而再度混沌化了的历史，亟待更为深入而切实地建立其体系、结构。就中古史而言，也就是要重新建构中国和中华民族各时期的历史场景和发展脉络，才能使仍然身处其传统之中的当代国人，得以知晓自身历史创造的来龙去脉和前提条件，也使今人和后世得以凭此判断中古史界工作的价值。而这种“梳理”在当前之所以一定会是某种“重新建构”，则是因为当代中国史已雄辩地证明：近代以来对中古史的诸般梳理，无论是共性论还是特色论，虽皆超越了旧时的王朝兴衰范式而多尖锐明快之处，却皆基于外来所见而不免片面，在结合中国实际，揭示古今中国的内在联系时终隔一层，也就难以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和走向，实际已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失守。面对这样的状况，如何明确方向、走出困境，突破诸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迷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了。由此观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仁近年以来最为可贵之处，端在其综合继承了近代以来几大阶段史学及相关研究的成果，始终坚持在更为精深的个案讨论时，着眼于魏晋南北朝而观照、贯通秦汉至隋唐史，从而在重新建构中古各时期历史场景和发展脉络上，有了长足的推进，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

也正是这种特具整体背景、结构的局部或个案研究，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史界同仁近年以来在冲破困境时鞭已先着的体现，也导出了若干出色的成果。可以认为，今后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以更多精深的个案和局部讨论，来进一步说明这个断代的基本特点

及其在中古史上的地位。为此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各领域学者熟知，却远未被整体地得到重视的事实：从门阀等级、占田均田、三省制度、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玄学兴衰、谶纬符命、方技术数，乃至北族汉化、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等等，这些对当时各领域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节目，均在汉魏至隋唐经历了势头形成、特征凸显直至消退终结的完整周期。这些周期的存在和展开，不仅提示在此背后存在着更为基本的历史过程，否定了仅在其内部，或仅以其中一二来解释这些事态的合理性；且亦分别在终点和起点上指明了秦汉和唐宋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直接关联着先秦和近代中国的发展态势。而魏晋南北朝，正是相关事态从定型展开到消亡完成，同时又新绪再发而源流间出的关键时期。我愿在此呼吁学会全体同仁，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时，倍加关注这些周期之所以出现和转折变迁的基础、条件，倍加关注这些周期的历史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倍加关注这些周期何以不约而同地在魏晋南北朝完成了最具决定性的发展历程。我相信，无论是哪个领域，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围绕于此持续关注 and 积累，就可以形成共同关心的问题，促进有效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显著提升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水平，切实推动足以沟通和解释古今中国发展变化的中古史场景和脉络的建构进程。

应当说，一段时期以来史界的种种遭逢，正是我们自身所处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写照。要挣脱束缚前进，不免会要较多地否定过去，至于将来，则可在摸索中逐渐明确。中古史的研究者们，似也同样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史家要渡的，毕竟不仅是短时段中的当下之河，而是势必要面对奔流于历史丘壑之间的万千波浪。在这样一个无穷大的未知基数面前，一旦否定过去过甚，失去各种标明了方向而可供比对的整体参照系以后，所有逐个摸到的石头，实际上很难凭以修正方向，极易成为无序现象的碎片。而结果便是：在走，却已迷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是：既然史界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那么史家遇到的问题，又何尝不是举国上下共同面临的问题呢？不仅今天的中古史研究，当代中国诸多领域的社会实践，恐亦同样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前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的迷惘。人们也正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多方探索，提出种种可以帮助判断当下坐标和未来方向的“顶层设计”。而其共同点，也无非是要使探索基于某种整体背景和结构，以便通过比较、讨论而凝聚共识，明确前景和轻重缓急，涉过深水潜流之区而臻于坦途。我想在此强调的

意思是，所有合理的整体背景和结构，都须首先基于准确的历史认识来获取，都必须真正立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总的发展进程来看待。因此，当下中古史反思开辟新的走向，对于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认识来说，无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立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重新建构其历史场景和发展脉络，这实际上是本土中古史专业研究者永恒的天职。而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说到底无非是时代潮流总在冲破既有构架的阶段性现象。所有以往的梳理都有待今人扬弃，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尽管社会迅疾变迁，人心左右浮动，但历史就在那里，方向就在那里，道路就在那里，学者需要的首先是秉持天职的定力。谨愿以此与学会同仁共勉，与中古史界的所有同仁共勉。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

2015 年元月

目 录

《魏书》与《史记》的对比研究	李 凭(1)
玺出襄阳:刘备称帝时的一个政治传说	凌文超(7)
前秦政权败亡原因新探	
——淝水之战后苻坚苻丕父子策略的失误	黄寿成(30)
北魏祖先认同的再检讨	
——以拓跋皇室对“幽都”的记忆为切入点	曾 磊(41)
黄帝文化与北魏政治	陈金凤(51)
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县令长史迹钩沉	贾小军(63)
北魏的州郡兵	薛瑞泽(78)
北魏恒州刺史研究	马志强(86)
西魏北周府兵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与意义	熊 伟(100)
论东晋南朝的三种县侯	王安泰(110)
北魏后期的爵制及其特质	
——以孝文帝爵制改革为中心	[日]大知圣子(120)
魏晋时期河西人口蠡测	高 荣(138)
北朝民族格局的演化与民族认同客观条件的成熟	
——以领民酋长制的实施、衍变及领民酋长的活动	
为观察视角	段锐超(150)
北魏政权下的乌桓	[日]三崎良章(173)
试论汉匈奴族群认同的变化	
——以儒家孝道为中心的考察	冯世明(185)

三国两晋南朝政区琐论	胡阿祥(199)
曹魏南阳郡领县辨正	张旭华(220)
20 世纪以来北魏都城平城建制研究述要及补缀 ... 徐美莉	马志强(230)
六朝的军事、漕运与新兴城市:以巴陵城为中心的考察	张晓东(245)
北魏后妃族属分析	苗霖霖(256)
南朝的士庶区别	[日]川合安(266)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	王永平(274)
北周前期宗室势力与主相之争	武岑怡 范兆飞(304)
山西张壁古堡可汗庙泥包铁像的人物原型推敲 ... 钱 龙	李书吉(340)
魏晋玄学对北宋前期理学的影响	
——以易学为中心	严耀中(351)
《帝王略论》的正统观	[日]会田大辅(362)
习凿齿名字释义	叶 植(378)
崔浩的天人思想与北魏政治文化	孙险峰(391)
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	张丽君(413)
赞美掩盖下的死亡终结	
——解读魏晋节烈妇女的自杀行为	刘 洁(424)
北齐文林馆考论	杨 龙(436)
论晋代法赙和丧仪中体现的丧制等级	高二旺(457)
魏晋南北朝墓志家谱初探	王仁磊(467)
接受史视阈下鸠摩罗什形象嬗变的历史考察	冯金忠(477)
白道考	
——北朝隋唐时期的草原之道	[日]松下宪一(489)
北魏畿上塞围寻踪	刘溢海(500)
左云及邻近北魏陵墓野外观察探究	刘志尧(508)
北魏、东魏时期端氏县酒氏家族的佛教造像事业	[日]北村一仁(518)
北魏洛京的建立与释教信仰生活的新启	
——太和十七年(493)迁都至景明二年(501)洛阳筑坊	周 胤(535)
西京博物馆北朝墓志可资补史、正史举例	殷 宪(575)

《王遇墓志》再考	王银田 (595)
北魏平城墓葬中的河西因素	倪润安 (603)
长沙吴简中的《叩头死罪白》文书木牋	[日]伊藤敏雄 (624)
对中仓黄龙三年十月旦簿的复原尝试	邓玮光 (645)

《魏书》与《史记》的对比研究*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 李 凭

一 《魏书》与《史记》

二十四史中,只有三部首称黄帝,就是《魏书》《北史》和《史记》。《北史》是在《魏书》的基础上编辑成的,自可不论。《史记》首卷为《五帝本纪》,^①五帝之首是黄帝,在黄帝之后的四帝中,则以尧、舜二纪最周详,也最为后人熟悉。《魏书》首称黄帝,^②而且刻意将拓跋首领始均与尧、舜拉到一起,这表明魏收编撰《魏书》时受到《史记》的启发,其中《序纪》受《五帝本纪》的影响最为深刻。

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之外都是断代史,多数以汉族为主导。但是这些断代史并不都模仿《史记》,《汉书》就有许多与《史记》相左的地方。^③《魏书》是专门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何以偏偏要模仿《史记》?

因为,《魏书》与《史记》在编撰体例上具有相同之处。《史记》虽然以西汉王朝为重点,但是记述了上古至秦的史实,是一部通史。《魏书》虽然以北魏、东魏为重点,但是记述了拓跋部从嘎仙洞起源到代国

* 本文系澳门大学科研基金项目“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editions of the Twenty - Four Histo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of the Twenty - Four Histo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项目编号:MYRG2014 - 00066 - FSS)的阶段成果之中译文本。

①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2011年。

② 《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2011年。

③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2011年。

的史实。与《史记》一样，《魏书》也是一部通史；所不同者，《史记》是华夏的通史，而《魏书》是拓跋部的通史。当然，体例相同只是表面原因。

二 司马迁建立历史系统

司马迁的历史系统虽然庞大，却是有条不紊而纲举目张的。其纲领为《五帝本纪》，其要目是《三代世表》。

作为纲领，《五帝本纪》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其他四帝都是他的子孙。颛顼是黄帝之孙，其父昌意是黄帝正妃嫫祖的次子；帝喾是黄帝曾孙，其祖父玄嚣是嫫祖的长子；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而舜的六世祖为颛顼，他是黄帝的八世孙。^① 按照这样的编排，四帝后裔全都出自于黄帝。

《三代世表》是司马迁历史系统的要目。虽然三代指夏、殷、周而言，但是表中并不仅仅排列三代的世系，而是往上追溯至黄帝，往下延续及西周共和以前封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十一诸侯。^②

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创造了一种强调血统的语言格式，表述为“某属+某生”。比如，夏的血统被表述为“夏属，黄帝生昌意”^③，其意为，夏属于黄帝之子昌意后代中的一支。通过这样的语言格式，司马迁将上古到先秦的诸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同属于黄帝后裔的特点，鲜明地凸显出来。

以《五帝本纪》为纲领，以《三代世表》为要目，司马迁为世人编织成一张硕大的网络。这就是司马迁的历史系统，缔结这张历史系统网络的纽带是血脉。

继《三代世表》之后，司马迁又编撰了《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48页。

②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487—508页。

③ 同上书，第488页。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等年表。^① 这些年表也都是以血脉为纽带编织的网络，它们可以看作为《三代世表》的延续与补充。

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诸王、诸侯与黄帝的血缘有明显的亲疏之别。这种亲疏之别从表面上看是血脉的远近，实质上显示森严的封建等级。按照亲疏之别，诸王与诸侯大体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在血缘关系上最接近黄帝的四帝，以及三代的先祖禹、契、后稷。禹是颛顼之孙，为黄帝玄孙；契与后稷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都是帝喾之子，也为黄帝玄孙。^②

第二层次，有众多诸侯，他们的血缘都与第一层次的帝王相连，因此也与黄帝血脉相通。如，楚人祖先出自颛顼，陈胡公满是舜的后裔，宋微子开是殷朝帝乙之首子、纣之庶兄，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叔，鲁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卫康叔封都是周武王之弟，晋国祖先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郑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庶弟。^③

第三层次，情况比较复杂，多数被列为《史记》的世家，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比较含混。这些诸侯，或者道不出始祖，或者难以理清世系的脉络，他们与黄帝的关系是勉强扯上边的。

然而，正是按照附会的逻辑，华夏各姓氏大多可以在司马迁的血脉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甚至处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也都可以挂到这张网络上。按照司马迁的布局，为后世陆续进入中华域内的各族留下了入围的空间。《黄帝本纪》声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④。关于这十四位得姓者，司马迁已经难辨清楚；至于另外十一位未得姓者，就更加无从考证。既然难辨清楚或者无从考证，就留下了填空的余地。

①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卷一五《六国年表》、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②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49页；卷三《殷本纪》，第91页；卷四《周本纪》，第111页。

③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689页；卷三六《陈杞世家》，第1575页；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445页；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第1515页；卷三九《晋世家》，第1635页；卷四二《郑世家》，第1757页。

④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9页。

三 魏收推广历史系统

魏收对于司马迁的精神领悟至为深刻，具体表现就是在他的《魏书》中也建立了血脉相连的体系。魏收的历史系统也是纲举目张的，纲领为《序纪》，要目则是《姓氏志》。

在《序纪》中，贯穿着早期拓跋氏发展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拓跋部在大鲜卑山“射猎为业”；第二阶段，拓跋部“始居匈奴之故地”；第三阶段，拓跋部“迁于定襄之盛乐”。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现，反映了拓跋部姓氏组织的变化。大鲜卑山时期，衍生出九十九姓，这是拓跋部繁衍时期；匈奴故地时期，分化成为所谓的七国，在姓之下出现了氏，这是拓跋部大发展时期；盛乐时期，建成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广泛接纳草原游牧部落，形成“诸姓内入”的兴旺局面，这是拓跋部发达时期。^①

北魏建国之后，开国皇帝道武帝采用离散诸部措施，陆续将游牧部落民整编成为封建统治下的编民。编民的大多数被安顿在国都平城附近，实行“分土定居”^②。孝文帝迁都之后，平城附近的编民随同拓跋政权进入新都洛阳附近。虽然屡经迁徙，但是由于经历过整编，原部落民姓氏的归属相对稳定，这就为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奠定下基础。而孝文帝姓氏改革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少数民族的姓大多改成为汉姓。改汉姓的成果，被魏收记录到《魏书》之中，成为魏收编撰史书的创举。

魏收没有编写像《史记》那样的世表，但是在《魏书》的《官氏志》之中特设有《姓氏志》。^③《姓氏志》具体反映了拓跋部内外姓氏变化的状况，发挥着世表的作用，成为魏收历史系统的要目。

于是，魏收就以《序纪》为纲领，以《姓氏志》为要目，也像司马迁那样，构建起一张网络，这张网络普遍联系着北朝的部族，它的核心则是拓跋部。不难发现，像司马迁笔下的诸王与诸侯那样，魏收笔下的北朝部落姓氏也是依照与拓跋部关系的亲疏划分层次的。

① 《魏书》卷一《序纪》，第1—3页。

② 李凭：《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③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5—3015页。

第一层次，是七分国人分裂成的十氏，包括拓跋帝室，以及与帝室亲缘关系密切的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和系侯亥氏、乙旃氏、车焜氏，这是拓跋氏的嫡系，身份最为高贵。^① 第二层次共有七十五姓，为“内入”诸姓，是陆续加入部落联盟的外姓。^② 第三层次包括三十五姓，它们按照东方、南方、次南、西方与北方等方位分布，与拓跋部保持所谓“岁时朝贡”式的关系。^③

由这三个层次的姓氏结成了等级分明的网络格局，下层为四方诸部，中层是内入诸姓，上层即帝室十氏。这样的层次划分，虽然比较粗略，却反映了拓跋部落联盟分化与重组的历史状况。

现在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出，与司马迁的网络相同，魏收编织的网络也利用了血缘关系。显然，处于第一层次的帝室十氏，都是拓跋部的血脉分支。但是，在魏收网络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中所列的部落，则与拓跋部没有明显的血缘关系。不过，在《姓氏志》中，不仅逐一列出这些部落的旧姓，而且标明了各自新改的汉姓。这样一来，众多部落姓氏之间似乎都由血脉潜在地沟通起来了。因为，大多数的汉姓，早就在司马迁那里被列为黄帝的后裔了。于是，通过汉姓的标示，原来并无血缘关系的部落竟然被血脉纽带系牢在一起，都被挂到魏收的网络上。

不仅如此，通过汉姓的标示，魏收的网络又可以全部挂到司马迁的网络之上。换言之，魏收网络就与司马迁网络合并成为一张更大的网络，这张更大的网络遂将北朝各族，包括新改成汉姓的部落姓氏与华夏旧有的诸姓氏，统统归纳成为一体。

四 精心的设计

返回来对比司马迁的《黄帝本纪》和魏收的《序纪》，不得不承认将拓跋祖先挂到黄帝名下是精心的设计。

首先，司马迁的历史系统中早已预留了空间，这个空间就在昌意的名下，被聪明的史家魏收发现了。昌意为黄帝与正妃嫫祖所生之少子，

①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6页。

② 同上书，第3006—3011页。

③ 同上书，第3012—3014页。

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却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正好听便于魏收的编撰。于是，通过所谓昌意少子的传说，拓跋部的初祖被设定成为黄帝的孙子。

其次，魏收作这样的设定，虽然不能令人信服，却有先例可循。不少姓氏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接到与黄帝血脉相连的网络上面，甚至东越王后裔得以奉守禹之祀，^①匈奴亦可当作夏后氏之苗裔，^②拓跋氏何以不能成为黄帝的后代？

最后，要看到这样的编造对拓跋部树立正统地位十分有利。

从辈分来看：其一，昌意是嫫祖之子，而嫫祖为黄帝正妃，则拓跋氏为黄帝嫡系，而非庶出；其二，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③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则与颛顼辈分相当；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帝喾才获得帝位，^④帝喾是殷和周的祖先，却是拓跋初祖的族子。拓跋氏建立的王朝甚至可与三代比肩。

在辈分和继承权两个方面，昌意少子都占据了制高点，不但北朝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华夏姓氏中也极少有超越者。由此看来，拓跋氏远认昌意少子为其初祖，正是为了表示，虽然他们居处偏僻的地区，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却是至亲至近的，其氏姓最为优越。这的确是超越前人的设计，编造拓跋氏的祖先源自黄帝的故事，最得便宜者竟然是拓跋氏。

姓氏的汉化，表面上似乎在向华夏族这边靠近，实质上是将华夏族与部落氏族一起置于拓跋氏之下。对于这样的精心设计，统治者乐于接受，客观上也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

①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4页。

② 《史记》卷一一四《匈奴列传》，第2879页。

③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1—12页。

④ 同上书，第13—14页。